梁伟. 经济分化视角下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基于A市B社区的调查［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0（4）：67-76.
LIANG Wei. Research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differentiation——based on the survey of A city B community［J］. 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1，20（4）：67-76.
DOI：10.13842/j.cnki.issn1671-816X.2021.04.008

经济分化视角下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
——基于A市B社区的调查

梁伟
（武汉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受社会资本、生命周期、人力资本及个人能动性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群体内部形成私营企业主群体、中层管理和技术工群体、自雇佣和务工人员群体的层化现象，其内在需求仍以基本的物质和情感需求为主，而非融入城市。农民工的能力差异导致群体的经济分化，这种经济分化与农民工的主观意愿共同成为农民工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阶层流动的有限性导致他们很难从底层向中上层流动。对大多数农民工而言，城市主要是作为获取财富的工作地，而非归属地。因此，对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要破除单向度的城市化、市民化思维，在充分保障部分农民工拥有融入城市的途径和条件的同时，要为无法留城的农民工提供稳定的后方，促进城乡之间双向有序流动。

关键词：农民工；经济分化；主观意愿；社会融入
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21）04-0067-1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流动发生了重大变化，突出表现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这满足了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促进了城市发展。但大量的农民工也带来各种城市化问题：其一，农民工分享城市交通、教育、卫生、医疗、娱乐等公共基础设施和资源，造成了诸多城市问题，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其二，农民工进入城市，城市人口激增，社会管理难度增加，而且农民工与本地人之间存在较大文化差异，存在潜在的社会冲突。因而农民工如何有序融入城市社会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重大挑战。

一、文献梳理

农民工社会融入的问题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基于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有学者从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多重维度进行了讨论，并将进城农民工的适应划归为三个层次：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这三个不同的层面是依次递进的关系，而农民工在总体上对城市的适应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1]。其他学者提出相似的观点，认为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融合是一种“半城市化”，农民工没有与城市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系统有效衔接，仅在经济系统上被接纳，在其他系统中却受到排斥[2]。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进一步分析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因素，认为长期的制度排斥尤其户籍制度是最主要的体制性障碍[3-5]。农民工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以及文化资本也影响着农民工的社会融入[6]，特别是社会资本积累的困境深刻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7]。在主观感受的角度上，有学者提出社会距离也会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8-9]，社会排斥以及社会差异发挥着同样作用[10]。当然，近几年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有所改观，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社会资本和受教育水平较老一代农民工有所提升[11-12]，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状况总体有所改善[13]。然而，低收入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状况仍不理想[14]，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15]。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融入中存在“两低两少”状况[16]，融入过程存在诸多风险[17]。此外一些学者关注农

收稿日期：2020-12-25 **修回日期：**2021-02-18
作者简介：梁伟（1995-），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基层治理，城乡社会学。E-mail：liangwei1813@163.com

民工的返乡适应[18]，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和问题以及在这一问题上普遍存在的政策“碎片化”现象[19]。基于对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的审视，学者们从政策制定、政策内涵、新型城镇化、农民工主体、风险防范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6，17-18，20-22]。整体而言，学者们大多秉持城市化、市民化的取向理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23-28]。

总体来看，学界对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研究运用了多样性的视角，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这对理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有一定的启示。不过，既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研究很少从农民工主体的角度解释其社会融入的机理，尤其是缺少对不同阶层农民工的分类分析；第二，现有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研究，多是在城市化、市民化这一视野下进行的，过于强调单向性，忽略了农民工的双向流动。本研究则希望通过呈现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经济分化与需求差异对其社会融入的影响，进而对单向度、抽象化的农民工社会融入路径进行反思。

本研究属于质性研究，调研地点是A市B社区。B社区现有固定住户3992户，人数约为9000人，其中农民工2000～3000人。这些农民工主要从事服务行业，部分在社区经营场所工作的农民工与社区内居民保持着较为密切的互动，其他农民工仅仅居住在社区，与社区居民关联甚少。笔者选取22名居住或工作于B社区的农民工作为访谈对象，他们在收入、年龄和文化程度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异质性，这为深入分析农民工社会融入的过程和特征，梳理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提供了典型案例。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试图阐明当前农民工群体中存在的经济分化和需求分层现象，并揭示农民工群体的经济分化如何影响其需求，二者又如何影响农民工的社会融入。

二、农民工群体的经济分化

进城务工并在多年后融入城市，抑或离开城市，这是大多数农民工的生命轨迹。在这一历程里，每个农民工都有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但这些故事又呈现出某些相同的特征和规律。

（一）“同途”与“殊归”：农民工的生命轨迹

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务工，农民便转变为农民工。在进城初期，农民工之间虽然存在着地域习俗、文化和职业等方面的差异，但在阶层结构上仍然相对均质化，他们的收入相对较低，生活环境也普遍较差。农民工初入城市，通常存在一些心理上、生活上的不适应，在政策、制度等方面也会受到区隔和排斥，尤其是在医疗、就业和教育等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农民工的能力差异，其群体内部逐渐产生了明显的差异和分化，最终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以下是三位受访者的情况：

刘晓，33岁，河北衡水人，初中毕业，来A市已有十多年。他的儿子在市里上学，妻子在家电超市做销售，自己经营着一家干洗店。来A市的前两年，刘晓一直在工地干活，后来嫌那里工作辛苦赚钱还少，就不干了。后来刘晓在B社区承包了一家干洗店，店铺租金3000元，一年下来勉强能赚7～8万元。然而，这样的收入对他来说只是“刚够花”。刘晓的妻子一个月也有3000～4000千元的收入，到月底基本就花完了。刘晓坦言道：“我也想过在A市买房，但是没钱啊，买房留A市也只能想想，现在就希望这个干洗店还能继续经营，起码有收入，等干不动了回老家生活。”

黄华，28岁，河南人，大专毕业，来A市五年。刚到A市时，黄华主要从事批发零售相关的工作，给超市供货跑业务。两年前，黄华为A市一个本地老板跑业务的时候，给老板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后来这个老板要转让超市，让黄华接过来干，黄华借着这个机会干起了超市行当。干了一年后赚了不少钱，黄华又用这些钱盘下了旁边社区的两个超市，他不仅把自己的父母、妹妹带来帮忙，还另外雇了几个人做事。现在黄华每年收入超过50万，还拥有一辆私家车。黄华说，当初自己来A市就是为了赚钱，但是现在事业发展得还不错，如果有实力也可以留在A市生活。

冯田，55岁，甘肃人，初中毕业。冯田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到了A市，跟着同乡做建筑工，那时村里出去打工的人很少。冯田刚做建筑工的时候很能吃苦，脑子也很灵活，因此没过几年就成了小包工头，在各个建筑工地上包活干。后来工程做多了，积攒了不少财富。现在的冯田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千万富翁。他在A市里有一套150多

平米的房子，价值好几百万，还开着一辆50多万的宝马汽车。除此之外，冯田在老家还有两三套住房。虽然在老家买了好几套房，但是冯田说：“老家买房子是个念想，回去了有地方住。以后肯定是在A市养老，一家子都在这儿。”

刘晓、黄华和冯田之间存在明显的经济差异，这种差异在农民工群体中表现为经济分化。农民工的经济分化是多种复杂因素组合作用的结果。在进城务工前，农民工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找好工作后进入城市务工。在城市务工期间，一些负担不重的农民工利用自身的人力资本优势，发挥个人能动性，抓住了工作、生活中的有利机会，建立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了很多社会资源。这些人有更多的机会将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并很快在农民工群体中崭露头角。随着时间的累积，这些农民工的个人社会资本和收入不断增长，他们的事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具备了更充分的社会融入条件。另一些缺乏人力资本的农民工，因为个人能动性不足，或者处在家庭生命周期的重要节点，比如赡养老人、抚养孩子等，积累的经济资本很快耗散殆尽，他们的社会资本也不能有效地转化为经济能力，最终在城市务工多年后被排挤在就业市场之外，只好回到农村生活。

（二）农民工的阶层分化

在农民工经济分化和分层研究中，学者多依据李强所界定的标准对农民工进行阶层划分[29]，这一标准尤其重视职业和收入。宋惠敏依据当前社会中经济收入的层次性分化将农民工分为低、中、高三个阶层[30]。黄江泉在研究农民工市民化时依据职业投入上的差异将农民工分为智能型农民工、技术型农民工和体力型农民工等三大类，每一个大类下又有几个小类[31]。张涛依据社会调查数据，按照农民工的可支配收入的多少将农民工分为4个阶层：下层收入者、中下层收入者、中上层收入者、上层收入者[32]。宋国恺在研究农民工体制问题时依据职业将农民工划分为私营企业主、自雇佣的个体农民工、务工人员、无业或失业农民工四大群体[33]。事实上，职业分层的分层标准最终可归结为两大因素：其一是经济资源，其二为象征性资源，第二点亦可理解为“潜在的经济资源”[34]。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以收入作为农民工阶层划分的标准是更为基础的划分方法。同时，农民工自身的主观认同是阶层划分不可忽略的方面。因此，在大城市A市B社区的调查中，结合黄江泉和宋国恺的分类标准，以职业为基础并根据农民工自身的阶层认同，本研究大致将农民工群体划分为：私营企业主群体，中层管理和技术工群体，自雇佣和务工人员群体，个案情况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本研究22个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他们在年龄、籍贯和职业上存在明显的差别。按照职业划分，22个访谈对象分别对应私营企业主、中层管理和技术工、自雇佣和务工人员。在这三个阶层中，私营企业主群体的人数最少，而且整体年龄偏大，但他们是农民工中物质基础最雄厚、事业最成功的群体。在城市中拥有住房和私家车，生活较为安逸。除了在城市拥有住所外，私营企业主通常还在家乡的县城或市区购置了住房。大多数私营企业主拥有大量的社会资本和较多的人力资本，且主观上积极进取。一些私营企业主在事业成功后，往往会关照身边的亲戚朋友，帮助他们发展事业，本研究的个案冯田即是如此。

中层管理和技术工群体的整体年龄相对年轻，青年、中年人居多。他们在事业上小有所成，生活环境和居住环境相对较好，部分人还拥有私家车。中层管理和技术工群体中的部分人经营着私人店铺，部分人已经担任中层管理的职位，抑或自己当小老板。这些农民工的收入低于私营企业主，但高于自雇佣和务工人员群体。中层管理和技术工群体中的农民工不愿将在城市积累的财富用于消费或者购置住房，而更愿意将这些财富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资本，推动自身事业的发展，他们也有一些优秀的品质和较强的能力。此外，中层管理和技术工群体在城市务工期间也注重积累人脉和关系，广泛结交朋友。前文中的个案黄华即属于此类。

自雇佣和务工人员群体的收入虽然在其阶层内部有所差异，但是总体上缺乏上升潜力。这一阶层贯穿老年、中年和青年多个年龄段。自雇佣和务工人员群体处于农民工群体的底层，而务工人员则处于最底层。自雇佣和务工人员群体大多租住在城中村或者居住在工作场所，他们在社会

表1 个案情况

个案	性别	年龄	籍贯	职业	所属阶层
冯田	女	55岁	甘肃	包工头	私营企业主
杨磊	男	37岁	陕西	销售	私营企业主
休二叔	男	62岁	河北	公司经理	私营企业主
路远	男	60岁	江苏	公司老板	私营企业主
楚建林	男	35岁	河北	销售经理	中层管理人员
黄华	男	28岁	河南	超市老板	中层管理人员
何成	男	26岁	辽宁	连锁店主	中层管理人员
李得富	男	57岁	河北	超市老板	中层管理人员
田晓芬	女	45岁	河北	私企职工	技术人员
刘美	女	24岁	山西	酒店职员	务工人员
李贺	男	29岁	江西	工厂职工	务工人员
钱威	男	30岁	湖南	汽修工	务工人员
王猛	男	32岁	安徽	工厂职工	务工人员
孟飞	男	44岁	河南	私营店主	自雇佣人员
韩二哥	男	28岁	河北	厨师	务工人员
朱海	男	56岁	河北	门卫	务工人员
郑瑞刚	男	42岁	安徽	汽修工	务工人员
白茜	女	38岁	河南	私营店主	自雇佣人员
刘文	男	20岁	山西	酒店小工	务工人员
卫逸	男	35岁	河南	汽配店主	自雇佣人员
武平	男	53岁	河南	私营店主	自雇佣人员
刘晓	男	33岁	河北	洗衣店主	自雇佣人员

关系方面也较为单一，其关系网络中的成员基本由三类人构成：同事、老乡和亲戚。前文中的案例刘晓以及大多数农民工都属于这一阶层。

三、经济分化背景下的农民工需求分层

农民工不仅在经济收入上存在着三个层次，而且相对应的文化结构、职业构成、生活方式、主观认同、政治权利行使等方面也存在显著层级差别[35]。在经济分化的背景下，经济分化对需求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首先，经济分化形塑各阶层的现实需求。农民工处于不同的阶层，经济收入存在差异，这让各阶层成员的现实需求产生了较大差异。对于自雇佣和务工人员群体来说，他们的经济收入基本只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所以希望更多地赚钱用以改善生活。对于中层管理和技术工群体，较高的收入能够满足他们的基础性物质需求，除此之外他们对于进一步发展事业的需求更加强烈。对于私营企业主而言，充裕的财富和事业的成功，让他们可以非常体面地生活，而且给了他们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条件。

其次，阶层的流动引发需求内容的转变。自雇佣和务工人员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向上层流动，中层管理和技术工群体也有可能成为私营企业主。当农民工所属阶层发生变化时，其需求的内容也会发生变化。自雇佣和务工人员成功向上层流动后，在赚取金钱的同时倾向于利用已有资本赚取更多的财富。中间阶层的农民工成为私营企业主时，财富观也会发生变化，在实现自身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同时，愿意利用自身的财富和社会资本帮衬亲友发展，以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

基于此，本研究依照农民工经济分化背景下需求的差异，对农民工的需求进行梳理，将其归纳为生活性需求、发展性需求、价值性需求。

（一）生活性需求

农民工的生活性需求主要有包括两方面，其一是物质性的，其二是情感性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农业收入的增长相对缓慢，进入城市务

工以获得更多的生活来源成为大多数农民的选择。

韩二哥，30岁，河南驻马店人。谈起他来A市务工的原因时，他这样说：“农村毕竟条件不好，我又是家里的老二，上面有个哥哥。说白了家里地是不少，但收入不好，被逼无奈只能出来打工。”

城乡差距、区域差别是造成农村劳动力在城乡流动的重要原因[30]。农村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农业收入极为有限，农民为获得更多的收入，流向就业机会更多、收入水平更好的城市。可以看到，对物质条件的追求成为绝大多数农民工的需求。

很多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多年后对城市产生了较强的归属感。正如韩二哥所言：“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在这儿待时间长了肯定会有情感。”虽然对他们来说，城市大多数时候只是工作的地方。农民工也有获得认同和尊重的情感，一些农民工虽然从农村进入城市，但也希望在城市中被人尊重，希望自己的劳动和价值得到肯定。笔者在与农民工的访谈中，经常听到类似于“得到尊重”“反感歧视”之类的词汇。黄华说：“自己现在雇了一个本地人，一个月给他开3000多元工资，现在十分尊重我的意愿。”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工的情感需求。

农民工不仅希望在城市里获得认可和尊重，而且对家乡的情感十分深厚。一些农民工认为城市是工作、赚钱的地方，或者在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看来是“好玩的地方”。农民工的根基在农村，对一些人来说“在城市中赚到了钱，养家糊口，比什么都重要，吃苦受累都是次要的”。许多人或许曾经想要在城市中长久生活，但现实磨平了他们的希望。

（二）发展性需求

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农民工，除了生活性需求外，还有发展性需求。在他们看来，较高的经济收入可以让他们发展事业，所以他们更愿意把手里的经济资源用于事业投资，以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事业，何成便是典型。

何成，今年26岁，辽宁沈阳人。他前年来的A市，现在经营着一家餐馆。餐馆生意很好，每天的收益大约在1500～2000元。这几年靠着餐馆，何成攒了不少钱。他用攒下的钱买了辆车，又用剩下的钱在附近商城里开了家连锁店，他还打算过几年再开几家分店，做大做强。他说：“现在的生活网游化了，每天做的就是打怪升级。所以要靠餐馆挂机赚钱，然后买点装备，打大怪”。

事实上，像何成这样的农民工只是少数。大多数农民工忙于满足生活性需求。一方面，农民工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甚至部分农民工仅能维持日常生活，缺乏实现发展性需求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期间，也需要应对家庭中的重大事件，诸如子女教育、老人赡养、住宅修建等，这使得农民工将目光再次转向了农村，无暇关注更高层次的需求。

（三）价值性需求

一些在城市闯荡多年且事业有成的农民工，历经多年的努力终于干出一番事业，赚足了面子。他们也愿意帮助亲戚朋友，以此实现价值性需求的满足，这种价值性的满足有时候要比“面子”更重要，休二叔便是一个例子。

休二叔，62岁，河北迁安人。在A市打拼了30多年，吃了不少苦。一开始他做过很多工作，诸如建筑工人、销售员、保洁工。后来休二叔自立门户有了事业，也算有所成就，如今他在A市有车有房，生活也算圆满。虽然今年已经62岁，但仍然在一家超市当经理，他心胸很开阔，也很乐观。他说，“希望自己再多做点事，发挥点余热。再帮衬帮衬年轻后生，让他们有点出息。”

休二叔的生活较为圆满，在城里有车有房，在老家也有几处房产。但是对于60多岁的他来说，追求的不仅是生活的舒适和安逸，还有自身价值的实现，而价值的实现来源于自我认同和社会评价。自我的认同是农民工对自己事业成就的认可和满足，其中还包括“成为事实上的城里人”的满足感。社会的评价则来自外界的评价，比如肯定他们的事业成就和生活，赞赏他们帮衬亲友的行为。

经济能力差异所导致的经济分化，对应着农民工的需求分层，这种需求上的分层一定程度上也对经济分化产生着反向作用。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现实性和非现实性需求，这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民工的工作积极性与努力

程度。大多数农民工进入城市，主要是为了获得经济收入。但是农民工对于收入的要求存在较大差异。一些农民工对工资的要求不高，所以他们很容易满足现状。新一代农民工进城打工，大多抱着探索新世界、见世面的心态，对工资的要求也不高。一些随父母和亲戚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更多的是为了实现情感性需求。但是，一些农民工在满足生活性需求的基础上，也可能有更高等级的发展性需求，更关注事业的发展和舒适的城市生活。最显著的变化是，他们把赚来的钱作为自身事业发展的资本。在多年的积累下，一部分自雇佣和务工人员成长起来，成为农民工群体中的中间阶层。中间阶层的成长和壮大，为上层农民工的出现集聚了潜在资源。大多数步入中间阶层的农民工可能会趋于保守，但是仍有少数的农民工有很强的成就欲和更高层次的需求，也更希望得到外界的肯定和认同，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间阶层农民工向上流动。

四、农民工社会融入差异

农民工能否真正融入城市，不仅取决于其经济能力，还受制于其是否有融入的意愿。农民工群体中的经济分化，产生了两个主要影响：其一，经济分化影响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样态，进而极大地影响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能力；其二，经济分化的进程形塑了农民工的需求分层，而需求分层主要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意愿。因而，农民工群体的经济分化使其社会融入在客观能力和主观意愿方面均产生了一定的差异。

（一）经济分化与农民工生活样态

农民工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生活状态和生活水平。因而，农民工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水平也因收入而异。

1. 居住环境区隔

首先在住房上，收入的差异导致了农民工居住条件差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居住区隔。私营企业主由于收入较高，财富积累时间长，有能力在城市中买房定居，可以享受较好的居住环境。冯田家早在10年前，就在A市三环附近的一个高档小区购置了一套150m²的大房子，购房时全款交付，花了300多万。而今，他家的房子价值大约为800万。像冯田这样能够在A市买房的农民工，只是极少数。经济上的优势，确实使少数农民工能够在城市中非常体面地生活。而黄华这样的中层管理和技术工群体，虽然在城里买房能力不足，但是他的收入足以支持他在城市小区中租房，虽然短期内不能买房，但也能享受较好的居住环境。相对于私营企业主群体、中层管理和技术工群体，自雇佣和务工人员无力在城市买房，也不能支付城市社区的住房租金，只能租住在城中村、城郊村。相较于城市社区，城中村和城郊村环境更差。从自有住房到租住楼房，再到租住城中村、城郊村的平房，这体现了农民工的居住区隔。

2. 生活方式分异

在生活方式的形成过程中，经济条件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城乡生活方式存在巨大差异，农民工进城后或主动或被动地向城市生活方式靠拢[36]。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分化导致农民工社会融入层面的较大分异。私营企业主、中层管理和技术工群体基于经济条件的优势，更主动地改变自身的生活方式，他们注重自身的形象和言谈举止，愿意且能够购买高档奢侈品包装自己，以此提升自己的外在形象，也愿意花费精力学习，提高自身的素质，希望与城市居民“无缝对接”①。比如冯田，她每月都会去做SPA，出行以豪车代步。与此同时，中层管理和技术工群体的闲暇时间也更加接近城里人②。当然，他们的生活品质要比上层农民工低一些。这些农民工闲暇时间较为丰富，也有文化消费的需求。与上述两类农民工不同，自雇佣和务工人员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多一些，生活较为节俭。他们的衣着装饰很普通，闲暇的安排也更为单调。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长、强度大，闲暇时间较短；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需要应对生活中的经济压力，比如子女教育支出、父母赡养支出等。因此，自雇佣和务工人员既没有闲暇，也没有能力

① 黄华坦言：“我赚的钱也不算少，也买了车，穿的衣服也不错，不比城里人差，站在大街上你看不出来我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黄华，中层管理和技术工人群体）

② 休二叔说：“我双休日不工作，没有必要那么累。跟家人看看电影，聚个会，或者去听音乐会，不挺好的嘛。”（休二叔，私营企业主）

和意愿享受闲暇。

3. 心理认同分化

在心理方面的认同上农民工也存在着较大分化，包括对城市的认同、对自身身份的认同。私营企业主对城市有很强的认同感，认为自己就是城里人而非农民工[①]。私营企业主在进城时只是普通的农民工，经过多年的打拼成为了富人，并在城里买房买车。对他们而言，事业上的成功也让他们产生了心理上的满足和自我认同，所以他们将自己视为融入城市社会的城里人。而对于中层管理和技术工群体，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有在城里买房，“城里人感”不如私营企业主强烈，但是他们对自身认同的程度也比较高[②]。对于自雇佣和务工人员群体来说，他们仍认为自己是农民工，属于社会底层[③]。这与私营企业主的“城里人感”和中等收入者的自我认同感形成鲜明的对比。

4. 社会保障方面的能力差异

虽然在生活方式上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没有明显的差别，但是要在城市中长期生活，更重要的是社会保障，这主要指的是农民工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承受能力。由于城市里的教育成本较高，大多数自雇佣和务工人员选择将子女留在老家读书生活。只有极少数自雇佣和务工人员会带着孩子在城市里生活、读书。而私营企业主和中层管理和技术工群体，大多会让子女在城市里成长。一个来自陕西的访谈对象杨磊，他的女儿从小就在A市读书，一直到初中毕业。杨磊这些年为女儿的教育投入了几十万，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杨磊一家的生活品质。后来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杨磊的女儿只能回老家读书，杨磊的妻子便在西安租了一套房，陪着女儿读书。此外在医疗方面，经济分化也对农民工产生了类似的影响。

总之，经济分化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多个面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收入差异的持续性最终影响了农民工的发展方向，收入越高的农民工越可能融入城市，而收入较低的农民工只能在务工多年后重返农村。

（二）需求分层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意愿

农民工进城的目的不同，大多数人是为了追求财富，少数人或是出于对城市的好奇，或是为了见世面，或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机会。农民工的城市生活因个人的人力资本、机遇和社会资本差异，以及生命周期的作用而出现分化。与此相对应，他们的城市融入意愿也产生了分化。处于生命周期特殊节点的农民工，由于家庭的责任和负担，一方面追求更多的财富，另一方面又恐惧事业失败的代价而趋向保守，所以更愿意选择稳定的、长久的、薪酬尚可的工作，以满足基本的生活性需求，放弃融入城市的意愿。前文中的韩二哥在A市当厨师多年，现在上有老下有小。今年30岁的他，对于融入城市并无太多的想法，他觉得稳稳当当地赚些钱以赡养父母、抚育孩子比什么都重要。

一些农民工除了基本需求外，还希望在城市生活中获得更好的发展。前文中的黄华即是如此，但是对于他们而言，融入城市并非最重要的任务[④]。正因为中层管理和技术工群体有发展性的需求，也更加看重事业发展的机会，更多地选择利用现有资本投资或壮大产业，所以中层管理和技术工群体的融入意愿也不强烈。

中层管理和技术工群体中的少数人，在时间的累积作用下，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获得了更多的财富，也积累了更多的事业发展经验，并成为富人。这些富人形成了价值性需求，在城市购置居所，实现融入愿望，并将自身的资源和经验分享给人际网络中的重要个体，从而实现社会层面的自我价值，前文中的休二叔即是如此。也因此，富人更倾向于安居乐业，融入城市生活，成

① 冯田说：“我要房有房，要车有车，要生活品质有生活品质，一年赚几百万，比城里人更城里人，只是没户口罢了。”（冯田，私营企业主）

② “你看我是外地人，我那个店里就雇了一个本地人当收银员，他还住在这小区里，一样要在我这里上班，我给他开工资。”（黄华，同上）

③ 韩二哥说道：“我们出来聊天，大家都觉得自己是低阶层的，时间长了对这儿是有感情，可是再有感情咱也不是这的人，不属于这里，没钱没房的，迟早要回去。”（韩二哥，30岁,自雇佣和务工人员）

④ “在A市买房最主要是保值,你说真要去住啊什么的，那是不大现实的，你就说这里的房子吧，也不是很好，也要个两百多万。有这两百多万，咱干啥不好，你租个小房子，一年两三万也就够了，你留出剩下的钱，干什么都可以。以后挣得差不多了，再买房也不迟。”（黄华，同上）

为事实上的城市居民。

（三）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可能性

整体来看，以个人能力为基础的经济分化影响着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意愿，中下层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自雇佣和务工人员的收入较低，他们既缺乏足够的经济条件融入城市，也难以产生城市社会融入的主观意愿。处于较低层级的农民工主要追求生活性需求的满足，他们的主要精力在于获得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的收入。因此，对于大多数农民工而言，城市不过是赚钱的地方。即便一些农民工产生了融入城市的渴望，阶层分化也使得他们最终难以成功融入城市。虽然中间阶层的农民工物质基础较好，可以为他们融入城市提供必要的经济条件，但是他们大多面临家庭重大事件，如结婚生子、子女教育等，财富容易被分散，较难形成财富集聚。而中间阶层的发展性需求，激励农民工将经济资本用于发展事业。因而对于他们来说，融入城市不是首要目标。上层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可能性最大。上层农民工在经济能力方面不存在问题，而且从需求分层的角度来看，私营企业主为了社会价值的实现，更愿意在城市里买房，不仅可以拥有一个舒适的住处，也能得到外界的“称赞”，同时可以利用自己的财富消解制度性排斥。比如在教育上，虽然没有户口子女无法上公立学校或参加高考，但私营企业主可以让孩子上私立学校或者把孩子送到国外。此外，大多数私营企业主为中老年，他们的孩子在城市中成长，与城里人相差无几。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他们通过消费形成新的分层标准，逐渐消除“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壁垒，进而较好地融入城市。

总之，在自雇佣和务工人员群体身上形成了一种循环：工作—满足生活性需求—返乡。在这种模式下，农民工虽然无法融入城市，却在城市务工过程中实现了基本的需求，也形成了一定的财富积累以享受更好的返乡生活。也因此，即便不能成为城里人，农民工也愿意进城打工。在中层管理和技术工群体、私营企业主的社会融入过程中，也形成了一种循环：进入城市生活，在城市中借助个人、社会资本的力量，在经济和时间的累积下不断发展，取得事业上的成功，进而在发展需求满足、财富积累充裕时转向社会价值需求的满足，融入城市以及向下转移、分享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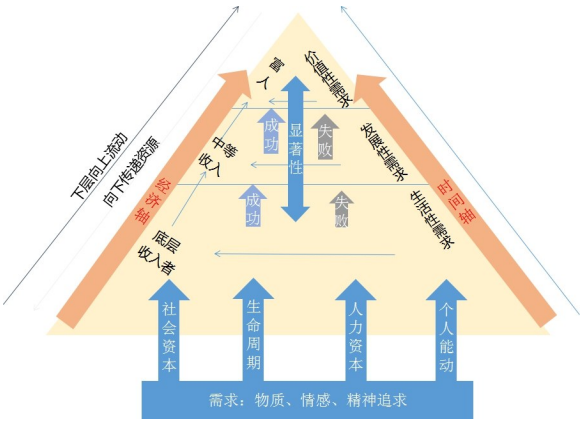


图 1　农民工的经济分化与需求差异

综上，农民工的经济分化在动态调整中演化，影响着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经济能力和主观愿望，从而形塑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整体结构。这一金字塔的结构意味着能够流动到塔尖的农民工群体较少，多数农民工仍然位于底层。因此，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不是一个应然的市民化问题，在制度之外，应重点考虑农民工在自身的阶层结构中是否有能力、有意愿融入城市。

五、结论与讨论

农民工群体在进城伊始时接近于一个同质性群体，然而在城市务工的历程中，农民工群体向着异质化的方向发展。在城市务工期间，农民工群体因能力的差异发生了经济分化，即私营企业主群体，中层管理和技术工群体，自雇佣和务工人员群体。在经济分化的基础上，农民工的需求也产生了分层，自雇佣和务工人员群体更多地满足于生活性需求，中层管理和技术工群体更多地满足于发展性需求，而私营企业主更多地关注价值性需求。农民工的需求也反向影响着经济分化。农民工的经济能力和主观需求产生了差异，而这些差异恰是农民工能否成功融入城市的关键之所在。自雇佣和务工人员群体通常既无足够的经济能力，也缺乏相应的主观意愿，因而这一阶层难以成功融入城市。对他们而言，主要是适应城市生活而非融入城市生活，城市仅仅作为赚钱和养家糊口的地方。中层管理和技术工群体虽然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但他们中的大多数着眼于事业的发展且相对保守。私营企业主具备充足的

融入城市的经济能力，而且事业处于顶峰时期，发展性需求已经得到实现，他们更多地希望满足价值性需求，其中就包括在城市中安生立命的需求，具备了融入城市的主观意愿。因此，最有可能融入城市的是农民工阶层中的私营企业主。

在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方面，学者多倾向于改善农民工处境，争取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权利，进而促进农民工成为新市民，这是一种典型的农民工城市化的逻辑。一般认为，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多年后，会产生对城市的归属感，希望在城市中生活、定居。现实中，很大一部分农民工确实产生了对城市的感情，但这并不表明农民工一定会选择城市生活，很多农民工由于缺乏融入城市的经济基础而不得不选择离开城市返回农村。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并非仅仅是城市二元结构的问题，也并非是一个群体融入另一个群体的问题。更大意义上，农民工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收入而进入城市，这是大多数农民工最基本的需求。虽然在城市务工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其他需求，但是大多数农民工并没有融入城市的意愿，也即没有完整的社会融入需求。所以，应当对单向度的城市化路径进行反思，既要看到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的客观可能性，又要看到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态度，尊重农民工可退可进的主观选择，并对其选择予以充分支持，在制度上、政策上积极回应，让农民工既有条件、有途径融入城市，又能够从容、安然地返回农村[37]。城乡之间的双向有序流动，恰恰构成中国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基石。

参 考 文 献

[1] 朱力. 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 江海学刊，2002（6）：82-88.

[2] 王春光. 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 社会学研究，2006（5）：107-124.

[3] 李强.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半融入”与“不融入”[J]. 河北学刊，2011（5）：106-115.

[4] 丁宪浩. 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分析[J]. 财经科学，2006（10）：99-104.

[5] 闫伯汉. 制度排斥、社会距离与农民工社会融入——基于广东省东莞市的分析[J]. 北京社会科学，2015（5）：65-72.

[6] 邵彩玲，张洪杰. 农民工的三种资本对其社会融入的影响[J]. 调研世界，2011（6）：34-36.

[7] 李爱芹.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J]. 广西社会科学，2010（6）：142-145.

[8] 徐延辉，邱啸. 居住空间、社会距离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J]. 2017（11）：127-136.

[9] 李伟东. 从社会距离看农民工的社会融入[J]. 北京社会科学，2007（6）：71-76.

[10] 胡宏伟，李冰水，曹杨，等. 差异与排斥：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联动分析[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1（4）：79-94.

[11] 何军.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J]. 中国农村经济，2011（6）：15-25.

[12] 赵立新.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市民化[J]. 社会主义研究，2006（4）：48-51.

[13] 王桂新，罗恩立. 上海市外来农民工社会融合现状调查研究[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97-104.

[14] 彭华民，唐慧慧. 排斥与融入：低收入农民工城市住房困境与住房保障政策[J]. 山东社会科学，2012（8）：20-29.

[15] 陈旭峰，田志锋，钱民辉. 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何以可能——基于理论的分析和调研思考[J]. 理论探索，2010（3）：93-103.

[16] 张庆武，廉思，冯丹. 新生代农民工经济融入状况研究——以北京为例[J]. 学习与实践，2015（12）：103-112.

[17] 王慧博.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融入风险研究[J]. 社会科学辑刊，2012（5）：58-65.

[18] 何绍辉. 双重边缘化：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调查与思考[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5）：64-69.

[19] 张旭晨. 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及社会融入政策研究———以甘肃省为例[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98-103.

[20] 李培林，田丰. 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J]. 社会，2012（5）：1-24.

[21] 王辉. 农民工社会融入：政策内涵及推进方向[J]. 农村金融研究，2011（4）：5-9.

[22] 鲁可荣，周洁，刘红凯. 新型城镇化中外来农民工社会融入服务及社会管理机制创新——基于浙江省武义县桐琴镇的调查[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2-7.

[23] 吴开泽，黄嘉文. 居住模式、住房类型与大城市流动人口留城意愿：基于广州的实证研究[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170-183.

[24] 韩嘉玲，余家庆. 离城不回乡与回流不返乡——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子女教育抉择[J]. 北京社会科学，2020（6）：4-13.

[25] 孙文中. 承继式累积：新生代农民工的购房型社会

融入研究[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3）：121-130.
[26] 徐延辉，史敏. 社区公民身份与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基于厦门、苏州、东莞、深圳等地的调查[J]. 社会建设，2020（1）：34-43.
[27] 蒋笃君.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困境与对策[J]. 河南社会科学，2019（12）：115-120.
[28] 罗竖元. 返乡创业质量与农民工就地市民化——基于湖南、安徽与贵州三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69-78.
[29] 李强. 试析社会分层的十种标准[J]. 学海，2006（4）：40-46.
[30] 宋惠敏. 农民工分层城市融入的治理模式与措施——基于农民工经济收入分化的标准[J]. 农业经济，2011（2）：64-66.
[31] 黄江泉. 农民工分层：市民化实现的必然选择及其机理浅析[J]. 农业经济问题，2011（11）：28-33.
[32] 张涛. 农民工群体内部分层及其影响：以收入分配为视角[J]. 青年研究，2007（6）：30-35.
[33] 宋国恺. 分群体分阶段逐步改革农民工体制问题———基于农民工分化与社会融合的思考[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7-13.
[34] 毛丹，任强. 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研究的几个问题[J]. 浙江社会科学，2003（3）：90-98.
[35] 宋惠敏. 中国农民工经济收入分层化实证研究[J]. 特区经济，2011（3）：271-272.
[36] 韩长斌. 中国农民工发展趋势与展望[J]. 经济研究，2006（12）：5-6.
[37] 贺雪峰.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10-18.

Research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differentia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of A city B community

LIANG Wei

(*School of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social capital, life cycle, human capital, and personal initiative, migrant workers have formed a stratification of private business owners, middle-level management and skilled workers, self-employed and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inherent needs still focus on basic material and emotional needs instead of integrating into the city. The differences in the abilities of migrant workers have led to the economic differentiation of the group. This economic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subjective wishes of migrant worker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limited mobility of migrant workers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hem to move from the bottom to the upper middle class. For most migrant workers, the city is mainly used as a place of work to obtain wealth, not a place wher they belong. Therefore, with regard to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t is necessary to get rid of the one-dimensional urbanization and citizenization thinking. It is urgent to fully guarantee that some migrant workers have the means and conditions to integrate into the city, and meanwhile it is necessary to provide stable support in their hometown for those migrant workers who cannot stay in the city in order to promote an orderly flow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Keywords: Migrant workers; Economic differentiation; Subjective intention; Social integration

（编辑：武云侠）